

# 地域文化與中國城市 認同危機

• 袁 瑾

從1980年代開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號召下，轟轟烈烈的城市改造和美化運動（如修高樓、建廣場、圈草坪、鋪彩燈等等）開啟了中國城市形象建設。經過1990年代的經濟騰飛和資本積累，中國一百八十多個城市提出了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在憧憬全球化及國際化的過程中，上海一枝獨秀，其城市形象重塑的成功來自於1930年代「東方巴黎」夢幻的延續。而與此同時，當中國各大城市經歷了現代化建設和國際風格的複製之後，千城一面帶來的歷史斷裂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認同危機接踵而至。隨着1990年代末國際大都市夢幻的逐一破滅，之後的中國城市形象開始轉向以人文和文化為核心的軟體建設。一場由大眾傳媒主導，以文化競爭為內驅力，以塑造新都市形象為目標的文化建構行為（即「新興的城市『造形』運動」<sup>①</sup>）在中國大地悄然而起。

在這場運動中，廣州媒體於2002年發起的「新廣州」想像表現尤為突出：其中包括醞釀期的「新時期廣州人精

神大討論」，發展期作為城市意識覺醒標誌出現的大型報紙系列專欄〈廣州地理〉，高峰期致力於復興本土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電視節目活動「新廣州人主義」，以及深化延續時期的城市民俗系列電視紀錄片《羊城度度有段古》和暢銷書《其實你不懂廣東人》等等，都預示了新世紀中國城市形象建設的某種新走向和發展趨勢。

與早期相比，此階段的城市形象建設更加注重表現個性與特色。「新廣州」想像中廣泛運用的文化意象，如古巷、民居、小吃、方言、傳說、民間工藝、戲曲、老行業、傳統民俗等等，無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文化。而當地域被奉為二十一世紀城市形象的新圭臬時，圍繞地域展開的文化想像與建構能否如預期一樣實現某種新的認同機制呢？這是尤為耐人尋味的問題。限於篇幅，以下主要以著名主持人陳揚<sup>②</sup>宣導的，以復興本土文化和城市精神為主旨的電視節目活動「新廣州人主義」作為解讀這一問題的典型案例。

隨着1990年代末國際大都市夢幻的逐一破滅，中國的城市形象開始轉向以人文和文化為核心的軟體建設。一場由大眾傳媒主導，以文化競爭為內驅力，以塑造新都市形象為目標的文化建構行為在中國大地悄然而起。

\* 此文為2008年廣東省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育項目「大眾傳媒與珠三角城市形象研究」階段性成果。



反映廣州文化的電視節目：《羊城度有段古》。

## 一 地域文化與社群主義的崛起

《新聞日日睇》<sup>③</sup>作為「新廣州人主義」概念提出的前奏，不僅創造了一個民生新聞的收視神話，更重要的是它顯示出地域試圖為當代文化尋求突圍的強烈訴求和旺盛活力，正如魯陸所說<sup>④</sup>：

作為廣州的文化正在衰落，不說粵劇無法與過去相比，一系列的民俗習慣之類，都成了弱勢文化，廣州人感到了巨大的文化失落。但由於傳統性格，他們也未必會大喊大叫，只在默默忍受。所以，利用電視優勢，恢復或增強廣州原居民的凝聚力，挖掘他們潛在的思想能量，消除或減弱城市裏因原來生活地域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分割，是新時期本地的一件巨大的任務。有了這種嚴肅的責任感，陳揚在一片東施效顰、模仿北方文化的聲浪中，堅定地喊出——我們要讓廣州文化發揚光大。

作為廣州本土文化精英，陳揚堅決宣導和弘揚傳統，試圖復興日益凋

敝的地方文化。無獨有偶，今日有關京劇是否應該進課堂的熱點討論還未有定論，但不同地域的人們爭相要求地方劇種也應進課堂的呼聲，則證明了「地域」已成為解讀當代社會的關鍵字和愈來愈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可見，當大多數人在談論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以及認同危機時，或許人們把過多精力都集中在討論如何用民族文化來抵禦危機，卻忽視了活生生的地域文化。畢竟，全球化歸根到底是通過向每個具體的地理空間不斷滲透完成的，也就是一個本土化、地方化的過程。所以，全球化與地方化在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現代性理論中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sup>⑤</sup>，地域文化才是全球化過程中真正具有反思力量和建構能力的文化主角。

與地域文化復蘇相伴隨的，是社群主義的崛起和擴張，因為地域文化既是對全球化的一種文化呼應，同時也是繼傳統的民族文化信仰日益模糊和淡漠之後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化認同趨勢。因此，更為具體而現實的社群想像正逐漸超越宏觀而抽象的民族國家想像，社群主義則成為全球化背景

有關京劇是否應該進課堂的熱點討論還未有定論，但不同地域的人們爭相要求地方劇種也應進課堂的呼聲，則證明了「地域」已成為解讀當代社會的關鍵字和愈來愈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

下風靡的一種社會思潮。然而，「社群」這一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界定，如國家、民族、宗教、種族等等。就當代中國的現實而言，由城市凝聚的社群認同無疑要處於優先地位。隨着城市化(或全球化)的急劇擴張，傳統的鄉土文明以及宗族認同已日薄西山，真正得以體現地域特色和活力的文化唯有潛入城市等待復蘇。城市作為激蕩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曖昧空間，不僅折射出轉型時期不同社會階層、心理，以及文化的劇變與危機，同時也為形成某種新的認同範式提供了最大可能，即以城市為空間基礎的地域認同和社群想像。

事實上，當代中國民生新聞的勃興(如江蘇的《南京零距離》、瀋陽的《直播生活》、遼寧的《新北方》等電視節目)本身就說明傳媒以地方或社群作為維繫大眾情感紐帶的傳播策略，相對於過去以國家為中心的宏大敘事更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而將城市明確作為復興地域文化的社群單位和想像的共同體，則是《新聞日日睇》在城市形象建設乃至培養文化認同方面一次大膽的嘗試和創新——「節目當然是給人看的，但社會上百人百樣，給誰看呢？普通平凡的廣州觀眾、『街坊』們，這種人佔廣州人的大多數，多是原居民，喜怒哀樂，油鹽柴米，衣食住行，一切都是構成這個城市的主要旋律。」<sup>⑥</sup>

「街坊」是《新聞日日睇》的慣用語，特指廣州原住民。原住民在這裏作為城市形象的主體是想像中結為一體的社群，而這個社群是建立在地域和語言基礎上的一種土著族群，因此這裏的社群想像主要是以廣州原住民為核心的族群想像。準確地說，電視媒體試圖建構的是一種接近於原生態的族群性認同，它依賴於長期穩定的

城市生活以及世代相襲的傳統。按照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其《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中的社群觀點，由這種傳統結成的認同模式具有高度的忠誠感和穩定性<sup>⑦</sup>。正因為此，《新聞日日睇》尤其熱衷於將老西關、老東山那種傳統的充滿社區溫情的鄰里生活作為廣州城市形象的代表，用老廣州情結喚醒市民的城市意識。

在2005年廣州實行區劃大調整期間，《新聞日日睇》的「廣州影像」環節製作的老城區懷舊系列「東山情懷」中有這樣一個片段：電視熒幕上，記者正在採訪一位世代生活在東山區的老人，他身後是東山古舊的紅樓和蒼翠的樹木，老人用地道的粵語鏗鏘有力地說道：「東山雖然不在了，但我始終是東山的人，我的仔也好，我的孫也好，永遠都是東山的人。」<sup>⑧</sup>這裏面集中體現的就是由於世代相襲於某一固定社區而自覺形成的親密感和團結意識，即族群性的表現，也是共同的城市生活積澱而成的族群性認同。

族群(ethnic)、族群性(ethnicity)都是人類學的基本概念，主要用於闡明人們處於社會群體中如何尋求身份認同與文化歸屬。按照韋伯的解釋，族群的形成是因為其成員認為他們共同擁有某些精神和物質方面的文化因素(如語言、宗教、習俗、信仰等)，並出於對殖民或遷徙歷史的記憶<sup>⑨</sup>，因此族群最根本的特點是它的成員都共用一種地方文化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族群性的建構意義，在於為人們提供一種在迅速流動和變化的當代城市生活中尋求自我身份與文化座標的重要途徑，因為「在晚期現代性的背景下，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

「街坊」是《新聞日日睇》的慣用語，特指廣州原住民。原住民在這裏作為城市形象的主體是想像中結為一體的社群，而這個社群是建立在地域和語言基礎上的一種土著族群。

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生存的孤立』並不是個體與他人的分離，而是與實踐一種圓滿愜意的存在經驗所必須的道德源泉的分離」<sup>⑩</sup>。因此，建立在族群性基礎上的社群想像，有利於人們重建傳統的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

然而，當城市共同體的想像，或曰新的社群主義建立在「純粹的」地域文化基礎上時，這種認同顯然是地緣性的、並且是原生性的，那麼對於外來的、非原生性的移民又意味着甚麼呢？齊美爾(Georg Simmel，又譯西美爾)早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一文中就指出，城市的本質在於陌生人的聚集<sup>⑪</sup>。那麼，企圖用貌似穩定而傳統的原住民文化去統攝所有的異質性文化並獲得普遍認同，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 二 都市化過程與移民身份認同

2005年3月，經廣州電視台的籌備，陳揚與近百名觀眾和網友展開了一場名為「新廣州人主義」的現場討論活動。「新廣州人主義」主要指的是廣州本地人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比如在活動一開始主持人就問觀眾有沒有煲湯、早餐是不是吃白粥和油炸鬼、能不能說一口地道的粵語等等，而「新」的涵義是針對當下不斷流失和衰退的廣州文化傳統提出的一種時間界定，即從當下開始重新樹立廣州人的文化自信。

該節目活動的中心議題是「廣州究竟是誰的家？」，即究竟是認同自己的出生成長地，還是認同自己現在生活的城市為家鄉，由此引發為一場極富爭議性的文化論戰。這是一個有

關移民身份認同的敏感問題，早在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沿海移民城市就已經歷過。美國學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通過分析晚清漢口地區的外來商人如何融入本地主流社會和文化生活，提出了「祖籍認同」與「本地認同」的概念，作為研究中國市民社會的一種重要路徑<sup>⑫</sup>。顯然，當代廣州及珠三角地區由於近三十年來迅猛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上億流動人口使得這裏的移民問題顯得最為突出。因此，「新廣州人主義」概念的提出及其引發的爭議有其產生的必然社會文化原因，具有當代中國城市研究的標本意義。

「新廣州人主義」涉及的問題與移民關係重大，但遺憾的是出現在節目現場的以廣州原住民為主，儘管有一人作為外來移民代表發言，但這個群體總的來說近乎處於失語狀態。因此，在電視以外的網路空間，這一理念激變為尖銳的地域文化衝突，其中有關方言的問題最能體現這場活動富有爭議的文化指向和本質所在——「天河那麼多寫字樓，隨便一間電梯裏你能聽到幾句廣州話？在天河吃飯，任何上檔次的餐館，你聽過哪一桌講廣州話？如果站在原住民的角度來看，他會問這是我的城市嗎，怎麼好像與我無關？」<sup>⑬</sup>

陳揚認為廣州人「首先是會講廣州話」，這意味着粵語成為界定廣州人身份的重要標記和文化符碼。誠然，語言是文化傳承最重要的載體，將粵語作為廣州文化得以延續和復興的一種手段，本身無可厚非。因為事實上，近幾年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城市日益高漲的保護方言運動中，都可以看到語言作為地域文化復興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把普通話視為威脅廣州文化生存和發展的強勢力量，這必

「新廣州人主義」強調本土文化的正宗地位，其中蘊含的主客意識本身，就包含了一種預設性的身份界定，即廣州原住民是主人，外來居民只有融入於本地原住民的生活，他才能算是廣州人。

然無形中將使用粵語為主的廣州原住民與使用普通話為主的外來移民置於矛盾的兩極。事實證明，後來不僅陳揚本人被冠以「方言恐怖主義」的惡名而遭到激烈聲討，且本地人與外江人分裂為互相攻擊的兩大文化陣營打得不可開交，這些都無情地幻滅了所謂「新廣州人」的美好想像。

儘管陳揚也承認外來文化的優勢和特色，並聲稱：「我希望通過我的節目，貫徹出我自己的概念就是『新廣州人主義』。簡單地說，就是要友好。提倡友好，讓內與外、新與舊都能夠和諧起來，友好應該是城市的主旋律。」<sup>⑩</sup>但客觀而言，「新廣州人主義」總體上似乎都在強調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和正宗地位，其中蘊含的主客意識本身，就包含了一種預設性的身份界定，即廣州原住民是主人，外來居民是客人，只有當客人歸化並融入於本地原住民的生活，他才能算是廣州人。依照這一邏輯，外來居民要成為廣州人，就必須會粵語、講粵語。在非廣東人看來，粵語是一種方言；而在「新廣州人主義」的提倡者看來，粵語實際上是廣州主人的語言。

說到方言，陳揚顯得尤為激動：「為甚麼中國人到了外國，千辛萬苦都要學外語，因為他知道誰是主誰是客。但是在廣州，沒有外地人願意學廣州話。外地人只有一句潛台詞：我來了——他要在這個城市裏尋找自己的事業。而廣州人，一看到外地人就先講普通話，這是主人的禮貌。而其他城市呢，北京人只會跟你說北京話，上海人只會說上海話……我不能強求你要把這裏當作第二故鄉，但你要起碼的禮貌和誠意，你到別人家裏做客，總有一個客套在裏頭吧。」「我沒有威脅任何人，我怎麼成了恐怖份子。」陳揚百思不得其解<sup>⑪</sup>。

可見，在城市化過程中，來自不同地域的人群如何在同一個城市實現認同，已成為當代城市文化發展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新廣州人主義」在原住民內部獲得熱烈響應和支持，但它所團結的是一個建立在本地自給自足「小傳統」基礎上的文化社群，對於人數更多的非原住民又意味着甚麼？「新廣州人主義」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陳揚雖然強調文化的融合，一再辯解說：「我不是為了外地人也不是為了本地人，而是為了這個城市的精神」<sup>⑫</sup>，但城市精神是甚麼？究竟是誰的城市精神？語言的歧義性和問題的敏感性常常將人們引入交流的誤區，從而引發不同文化群落的話語衝突，這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這場活動暗示了本地文化試圖歸化外來文化的雄心，但這種歸化並不是本地文化能量的自然流露，而是依靠媒介話語賦予的特殊權力所致，這顯然違背了文化自然生長的本性。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在談到結成文化共同體的問題時指出，文化的根本原則就是「扶持自然的成長」，即文化從本質上是不能被規劃的，應該讓文化自由發展，「文化雖然被人們身體力行，但往往有一部分沒有被人們所了解，一部分沒有被人們所認識。創造一個共同體往往就是一種探索。因為意識不可能先於創造，而未知的經驗也沒有公式可循」<sup>⑬</sup>。

可見，真正的城市精神來源於市民的共同參與，「新廣州人主義」之所以沒有達成建構統一社群的理想，反而還成為一種誘發分裂的契機，根本原因在於它主要兼顧的是本地原住民的利益和文化訴求，卻忽視了其他文化族群的感受和創造力，缺乏多方參與的平等交流機制。同時，這一現象還說明，任何一種文化建構行為必然

「新廣州人主義」沒有達成建構統一社群的理想，根本原因在於它主要兼顧的是本地原住民的利益和文化訴求，卻忽視了其他文化族群的感受和創造力，缺乏多方參與的平等交流機制。

帶有建構者本身的主觀色彩和價值取向，不同媒體的人的城市想像也會產生差異性(如〈廣州地理〉比「新廣州人主義」的敘述策略更為平和開放一些)。這裏就涉及到另一個關鍵問題，即誰來建構認同？怎樣建構認同？在諸多社群想像中，何種想像對應的認同機制最富有凝聚力？

無疑，這些都是作為具體建構者的當代傳媒必須理性思考和積極正視的問題，而本文探討的「新廣州人主義」對2000年代興起的這輪新的城市形象建設有何重要啟示呢？

### 三 原生性情感與公民政治的認同困境

客觀評價「新廣州人主義」，首先要肯定宣導人陳揚的本意是出於強烈的熱愛城市之情，其力圖保護地方傳統文化的責任感令人敬佩，事實也證明今日中國地域文化的傳承和復興要歸功於本土文化精英主體性的覺醒。但同時也要看到，「新廣州人主義」對於城市文化的界定帶有極強的地方本位主義色彩，這使得外來文化難以成為新地方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由此反而容易引起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衝突，使得地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裂變為建構城市認同的異己力量，這是特別值得警醒的地方。

地域文化衝突在當代中國其實早已露出端倪，當下借助傳媒的推波助瀾，尤有泛濫之勢：如圖書市場近年出版的地域文化暢銷書《河南人惹誰了？》、《東北人是咋樣的》、《阿拉上海人》、《其實你不懂廣東人》、《其實你不懂溫州人》等，都充滿濃濃火藥味；網路上以成渝之爭、京滬之爭等為代表的城市群體罵戰也是甚囂塵

上。這些都說明，隨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人群「原子化」所導致的認同危機將更加劇烈，而由移民潮所帶來的文化多元化以及身份認同問題，正是促成當下建構新城市與新城市人形象的深層文化動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頻繁曝露於媒體的諸如「新廣州人主義」、「新上海精神」、「新北京人」等等有關新城市的想像中，所謂的「新」往往只是一種修辭上的包裝策略，其內核不過是一種依附於老傳統的懷舊式本土想像。在這些想像中，傳統與地方文化都無一例外地被當作最重要的手段來建構城市認同，但問題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從本質來說恰恰是建立在反傳統基礎上的，這其中是否就暗含着一種建構模式的悖論呢？即用最保守的力量來充當愈來愈開放的現代社會的黏合劑，或者說是在用一種一成不變的地域文化(類似於本質主義?)來建構不斷流動着的現代性認同呢？

有城市學家指出：「當代城市是移民運動的擴展和共存文化的異質性的代表……根據其擴大和多樣化的情況創造出三個範疇的陌生人和三種層次上的陌生人，即國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組織的陌生人。」<sup>⑩</sup>這意味着，移民或陌生人才是構成當代城市的真正主體；如果要實現城市認同，就必須將「原子化」的大眾和陌生人通過某種可以共同分享的社群意識團結起來，因為「個人的自我目的不可能獨自實現，而必須在與他人追求共同的理想中才能實現……自我與他人一道構成社群，同時也成為構成自我的基本要素」<sup>⑪</sup>。這裏的問題是，當談到社群時，應該對其所指進行具體區分，由此才能發現認同危機的癥結

近些年頻繁曝露於媒體的諸如「新廣州人主義」、「新上海精神」、「新北京人」等等有關新城市的想像中，所謂的「新」往往只是一種修辭上的包裝策略，其內核不過是一種依附於老傳統的懷舊式本土想像。

所在。顯然，當代傳媒締造的社群想像來源於本土傳統和文化記憶，此種認同乃是依附於原生性情感的族群意識，而現代社會是建立在公民政治基礎上的市民社會，它更趨向於政治性的契約精神，此種社群認同與前者有內在的本質區別。

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其人類學經典著作《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中談到，「原生依附性情感」與公民政治既是構成新興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機制的主要方式，同時兩者也共同構造了一個巨大的矛盾性空間。原生依附性情感是一種天然的社群意識，它以一定的習俗、語言、地域、信仰等為紐帶，具有約定俗成的合法性和持久性<sup>⑩</sup>，因此當代傳媒在塑造城市形象的過程中，將原生性情感當成建構認同的最佳心理基礎和敘事途徑，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當代人渴望回復傳統的集體潛意識。但是另一方面，它卻有可能消解現代城市所宣導的公民政治文明。

現代城市從根本上來說是建立在城邦契約精神上的，契約精神是市民社會作為一個統一社群的基本信仰。「社群」一詞源於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城邦」，即「政治社群」概念。城邦是每個公民在契約基礎上，按照民主自治原則締結在一起的社群組織，而契約精神或城邦精神就是公民通過為城邦效忠而實現個體價值的獻身精神。這種城邦精神既是公民政治的表現，也是今日宣導的公民意識的源泉，在此原則下，市民遵循「合法性認同」，即「由社會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擴展及合理化它們對社會行動者的支配」<sup>⑪</sup>。這意味着在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現代都市，將市民結為一體的需要來自於組織化的社會生產和活動，市民的資格和權力來自於他個人

在這個社會中所具有的資本和行為能力。當一個外來者在取得了這個城市的市民資格(如戶口)之後，他擁有在這個城市中選擇自己文化歸屬的自由。他想說怎樣的語言、吃怎樣的菜、聽怎樣的戲，則完全取決於他個人的信仰愛好，而決不受任何外來約束。

可見，公民政治的認同原則適應於不斷流動的城市生活，它是構成現代性認同的合法性基礎；而原生性情感的認同原則和日益多元化、異質性，並且不斷變化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內在的根本性衝突。震盪在兩種原則之間的中國城市正面臨何去何從的認同困境。誠然，無傳統的城市是無根的城市，無個性的城市也無所謂城市精神，我們理應捍衛城市的傳統和地域特色，傳承和發揚城市的文化與精神。但就現實而言，如果僅僅只強調地域文化所具備的傳統認同功能，甚至將之作為唯一的認同標準，恐怕在建構城市認同的過程中會犯了避重就輕的毛病。

## 四 結語

從根本上說，當代中國城市的認同危機，正是由於公民政治匱乏所引起的合法性危機，例如城鄉差距所造成的二元對立結構，以及外來民工備受歧視的普遍現象，已成為今日中國城市發展的重大隱患。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地域文化崛起之時，我們既為傳統文化的重建感到欣慰，同時更要看到其崛起的具體背景和現實的認同困境。由此，當我們在建構共同的社群想像時，應該對社群的具體內涵和所指進行清晰的判斷和理性的解讀；在為地域文化和傳統喝彩的同時，也要注意用更寬容和開放的心態去構

當我們在建構共同的社群想像時，應該對社群的具體內涵和所指進行清晰的判斷和理性的解讀；在為地域文化和傳統喝彩的同時，也要注意到用更寬容和開放的心態去構建有關公民社會的認同機制。

任何社群的形成均有賴於團結意識的培養，民眾在社群的召喚下結成各自的社群的同時，是否將瓦解國家意識形態所賦予的同一性和凝聚力？這個問題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

建有關公民社會的認同機制。這是當代中國傳媒在建設新的城市形象中不可迴避的課題。

最後，筆者試從文化與政治層面提出兩點疑問：首先，地域認同如何與民族認同相一致？地域認同本身建立在差異性的基礎上，如果強化了這種認同，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削弱民族認同的共同傳統？其次，社群主義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如何調解？任何社群的形成均有賴於團結意識的培養，民眾在社群的召喚下結成各自的社群的同時，是否將瓦解國家意識形態所賦予的同一性和凝聚力？以上問題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

### 註釋

① 參見袁瑾：〈新興的城市「造形」運動〉，載高小康主編：《城市文化評論》，第一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頁156-63。

② 陳揚：廣州人，電視新聞節目《新聞日日睇》主持人，「新廣州人主義」倡導者，主持風格尖銳大膽、真誠直率，深受廣州市民喜愛。

③ 《新聞日日睇》，2004年2月由廣州電視台新聞頻道開辦的民生新聞節目，推出後深受市民歡迎，一年內創造日均幾十萬人的收視率奇蹟。提倡「用本土語言、本土視角，站在本土的立場上去解讀、表達新聞」。節目由「G4出動」、「廣州影像」、「有乜講乜」三部分組成：「G4」即good news for you，記者深入到廣州街區作現場新聞報導；「廣州影像」以音樂短片形式演繹本土風情及市民生活，展現廣州美好形象；「有乜講乜」讓普通市民針對某項民生話題展開熱議。

④⑥ 魯陸：〈家在廣州：陳揚與他的「廣州人主義」〉，廣視網，www.ycwb.com/gb/content/2005-02/28/content\_855962.htm。

⑤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52。

⑦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著，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65-67。

⑧ 廣州電視台頻道，「廣州影像·東山篇」，2005年10月5日。

⑨ 轉引自周大鳴主編：《中國的族群與族群關係》(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頁2。

⑩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9。

⑪ 西美爾(Georg Simmel)著，費勇等譯：《時尚的哲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頁188-95。

⑫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263-303。

⑬⑭⑮ 陳漠：〈城市精神：我不是為了外地人也不是為了本地人〉，新浪網，<http://chinanews.sina.com/cul/t/2005-06-29/1458134935.html>。

⑯ 引自艾輝：〈陳揚：我很討厭「明星」這個詞〉，金羊網，www.ycwb.com/gb/content/2005-03/27/content\_873074.htm。

⑰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著，吳松江、張文定譯：《文化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412。

⑱ [荷蘭]根特城市研究小組著，敬東譯：《城市狀態：當代大都市的空間、社區和本質》(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頁332。

⑲ 俞可平：《社群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8。

⑳ 格爾茨(Cliford Geertz)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頁307-28。

㉑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等譯：《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

袁瑾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講師